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 完善东亚治理的意义

陈 祥

摘 要:冷战结束后,中日韩需要面对人口少子老龄化、垃圾处理、毒品走私、传染病流行、生物多样性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些共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三国破解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全球化带来的区域化,为中日韩消弭各自国内对形成经济共同体的不利因素提供了巨大的源动力。为率先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三国还需优先对五个障碍性因素加以理清和破除。2020年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客观上释放了中日韩积累的合作势能,加速推动三国携手相助、布局后疫情时代的东亚治理合作。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三国时代 中日韩 新冠疫情 东亚治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DOI:10.19498/j.cnki.dbyxk.2021.02.00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当今国际秩序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的重要理念,是基于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际问题方法的新思考。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兴起了用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来解释中国“崛起”的风潮,然而,无论是按照进攻性新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来解释日益发展的中国,往往都是将中国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最

大“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助长其野心并带来全球的安全危机。^①显然，这种思维不论冠以何种“主义”，都是将国家之间的交往定位为传统国际秩序中以单方面满足自身利益为前提的零和竞争游戏规则。西方的部分学者完全不考虑中国国内具有何种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外交理念和世界认识，认为中国最终都要迫于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世界系统的结构限制下，与系统中最强国形成强烈的制衡乃至冲突，其终极目标是“追求全球霸权”。^②

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致使中日韩冷战结束以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异常曲折。这种理念不仅不利于问题的协商解决，往往还会连带激化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从东亚共同的历史传统、长远利益和民众感情出发，落实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有效剥除西方一些错误言论对中日韩关系的不利影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破除过去以自身利益为优先的国际思维准则，才能推进关乎三国未来命运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直接体现了当代中日韩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与地位，更是对三国的子孙后代负责。2019年末，“中日韩工商峰会”在中国成都召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出呼吁，“三国并非三国时代的魏、吴、蜀，不是相争关系。希望携手共筑‘新的三国时代’。”^③此后，2020年突如其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COVID-19，简称“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三国深刻感受到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

一、三国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需求

在中日韩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争关系只存在于极为短暂的时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三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友好交流，三国在文化、历史、

①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J.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K.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③ 《日韩关系坚冰有望融化》，新华网，2019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31/c_1210419046.htm.

传统、习俗、观念、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较多共性。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日韩在产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信、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令三国民众能够更加便利地跨越国境、畅通联系,中日韩在走向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更加便捷的区域化。由此,三国也遇到具有区域化特点的问题,例如:人口少子老龄化、垃圾处理、毒品走私、传染病流行、生物多样性等。

第一,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是三国不得不长期直面的严峻社会问题。少子化与老龄化往往不可分割,国际上对“少子化”问题并没有严格的界定,通常的做法是将总和生育率^①作为重要参照标准。日本由于较早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总和生育率很早就一路下滑,1975年跌破2.0降至1.91,1989年降至1.57创下二战后日本最低,称为“1.57冲击”。此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一路走低,2018年低至1.42。^②韩国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还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从80年代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2019年甚至低至0.92,估计今后韩国的人口问题甚至会比日本更为严峻。^③中国的生育率由于统计问题,在调查和普查时存在人口漏报的情况而在不断修正人口预测,加之采取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在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在1.6的水平”^④。虽然相比日韩,中国的人口情况要好一些,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未富先老的情况,形势或更为严峻。共同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使三国不仅需要就该问题根源的家庭社会形态、生育观、婚姻观、生育政策等进行探索,更需要携手就老年劳动力、养老护理、老年痴呆症、医疗制度、养老服务、保险制度等进行深度合作。

①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保证人口长远的结构性调整,该数值应该保持在1.8—2.1之间。

② 王伟:《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

③ 《韩国总和生育率呈新低 连续两年不足1》,新华网,2020年2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27/c_1210491417.htm。

④ 《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至1.65% 并未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新华网,2015年7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0/c_1115886591.htm。

第二,垃圾处理问题不仅关乎三国生存环境,还是关乎三国产业链条的重要问题。中日韩除了需要共同处理海洋塑料垃圾之外,还在产业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问题上存在高度产业合作和政策协调需求。21世纪初,中日韩曾一度形成一条看似完美的垃圾处理产业链,“从日本、韩国出口到中国那些油迹斑斑的汽车零部件、含绝缘体电线和塑料垃圾”^①,在中国进行分拣、加工,再生产出廉价的工业品出口给包括日韩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中日韩的国家、地方政府、企业都在遵循商业规则的前提下成为了所谓的“赢家”。最终,这种做法导致中国的环境不断滑向污染严重、人民健康遭受巨大损害的境地,且反过来对中国国内缺乏政府资金补贴的垃圾分类毫无兴趣,更让中国垃圾分类工作一拖再拖。日韩两国看似受益于此,于是在出售看似具有较高“利润”的垃圾之后,不再对剩余的垃圾进行更为深层的循环再利用,最终都走上“垃圾焚烧大国”之路。可见,垃圾处理问题是直接关乎三国的政策、民众生活、产业结构的问题,迫切需要三国携手加强合作,防止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竞相采取出口转嫁危机的模式。

第三,毒品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特别是近年来吸食毒品和走私毒品在全球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全球合成药物评估报告》指出,因在东亚、东南亚的需求增加,俗称“冰毒”的合成毒品甲基苯丙和第三代致幻毒品 NPS 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交易量日趋扩大,日本因国内毒品售卖价格与毒品生产国销售价格之间存在 10 倍价差,成为众多毒品犯罪分子瞄上的贩毒国度。^② 20 世纪 90 年代后,韩国、台湾的制贩冰毒技术转移到中国,在中国形成了制毒、国境贩毒和消费并存的局面。此外,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三国民众在现代文化、价值观上都产生了深远的相互影响。而三国演艺圈当中

① [日]阿部新:『廃棄物・リサイクル政策の国際化:越境移動問題との関連性を中心に』、『研究論叢,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1号。

② [日]「麻薬組織に狙われる日本とアジア」,nippon.comホームページ、2014年5月20日。<https://www.nippon.com/ja/behind/100062/>。

都存在着“名人吸毒”的现象,对于有前科劣迹的演艺人士,三国需要在加强处罚措施和封杀力度上共同行动,以降低艺人吸毒对青少年、粉丝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三国应持续推动禁毒合作机制,这是符合共同利益并将惠及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传染性疾病具有跨国界性,各国很难凭借国界对其加以封堵。中日韩的海上、空中交通十分便捷,三国间跨境旅行、交流的人数庞大且不断增加。2018年,中日双向往来人员达到1107万人次,其中中国访日游客达838万人次,日本访中游客为269万人次。^①中韩之间早在2014年就实现了访韩中国人和访华韩国人分别达633.5万人次和410万人次的“千万时代”^②。日韩之间的交流也极为密切,2019年访日韩国人达754万人次,访韩日本人达295万人次。^③鉴于此,中日韩于2003年在抗击非典疫情和禽流感问题上开展了卫生合作,然后在2008年第二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确定了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发生时的联系单位,并共同决定在信息共享、风险沟通、快速干预等领域进行合作”。^④然而,针对2008年确立的合作机制,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中日韩卫生合作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主导权不明确、合作层次单一、缺乏有效融资平台等一系列挑战。”^⑤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扩散,中日韩面对这场新型传染病毒的“战疫”,因地缘关系而更显影响重大。中国最先应战,日韩两国相互守望,为中国阻击疫情提供了许多感人、鼓舞人心的援助。随着抗疫形势的常态化,三国对一些重大经济社会活动做出调整,只有共同抗疫才能圆满达成各自目标,并将自身的损失、成本支出降到最低。

① [日]「日中交流1500万人实现へ」、『観光経済新聞』2019年12月20日。

② 《中韩人员往来进入“千万时代”》，人民网，2015年1月17日。<http://nm.people.com.cn/n/2015/0117/c356219-23587901.html>。

③ 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参见:[日]「統計・データ」、観光局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index.html>。

④ 《中日韩将共同应对传染病流行和食品安全问题》，新浪网，2008年11月2日。<http://news.sina.com.cn/c/2008-11-02/153216573368.shtml>。

⑤ 尹慧:《中日韩卫生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启示》，《当代韩国》2017年第2期。

第五,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础,包括了生物群集与他们生存环境形成的整体性生态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实际上,人类生活离不开生物多样性,但这种关系往往不明显,以致很容易被人忽视。人类的健康最终还是与良好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息息相关。如果生态系统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生物多样性损失就会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影响。^①以生物多样性为代表,中日韩在环境治理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是“三国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影响的关联性、环境治理经验的互补性,共享区域内生态环境价值,携手合作共同治理区域环境事务而形成的”^②。《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联合国三大环境公约之一,成员国于2010年10月在名古屋召开了第10次缔约国会议,以此为契机,中日韩三国生态学会举办了以“迎接COP-10,共话多样性,亚洲共行动”为主题的中日韩生物多样性论坛,开启中日韩生物多样性合作。^③至201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六次中日韩生物多样性政策对话。此外,中国将于2021年5月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④为达成并落实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中日韩必须摒弃在双边或多边问题中存在的偏狭,以大局观念、生存环境观念展开共同体合作。

上述问题都关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且又无法仅凭一国力量解决。中日韩携手应对并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前提,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条件和发展共同体的基本动力。

二、三国先行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基于全球化或区域化的共同问题,中日韩之间谈建立东亚共同体或

① 《生物多样性》,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s://www.who.int/globalchange/ecosystems/biodiversity/zh/>.

② 刘艳、王语懿:《中日韩环境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与意义》,《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4期。

③ 昆明植物研究所:《中日韩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在丽江召开》,中国科学院网站,2010年6月2日。http://www.cas.cn/hy/xshd/201006/t20100602_2872569.shtml.

④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9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30/c_1126565287.htm.

东亚联盟依然遥远,但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一体化、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是可能的。在第八届中日韩峰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三方要共同努力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前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将进一步强有力地推进自由而公正的贸易”;文在寅总统也呼吁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扩大亚洲自由贸易秩序”。当前,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面临种种挑战,前景依然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增长降速中独善其身,中日韩需要率先强化“经济共同体”的认识。

(一)中日韩产业链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中国学界围绕“10+3”会议模式,重点探讨了东亚区域合作问题,并且中国对“10+3”的东亚合作给予极高的期待。中日韩作为区域核心经济体的产业共同体日益突出,在当前国际体系变化中,日韩两国在出口方面也占据了重要份额,且拥有一套先进的制造、国际贸易和社会服务体系,更拥有相当实力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中国具有人类有史以来罕见的完整工业体系,有着极强的装备制造集成和施工建设能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日韩 FTA 进程实现突破的重要路径,这一思想引领三国根据产业链的分工开展各方面合作。中日韩合作发挥各主体在产业链上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对接各方供给和需求,形成符合各主体经济特点的合理高效产业分工格局,强化中日韩的全产业链合作。通过整合三国的优势资源,将资本、知识、劳动联合在一起,共同投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因,中日韩能够通过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二)美国作为三国合作的变量因素

在以往学界对中日韩构建共同体的研究中,均指出了美国因素,特别是强调美国“以夷制夷”的亚太安保战略的操控与影响,^①加之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存在以及他们配合美国推行“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的

^① 具天书:《“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韩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

具有连续性的区域战略。美国在东亚采取这种“分而治之”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搅乱中日韩的合作与共同体意识,然后再逐一向三方施压以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笔者也赞同从这一视角看待中日韩在构建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障碍性因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国在东亚的搅局、施压“伎俩”得以成功推行多年,是建立在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并牢牢“保护”日韩两国的基础上,美国的高压手段在“日美贸易摩擦”“韩美贸易摩擦”当中屡试不爽。今时不同往日,新冠疫情导致美国自身实力削弱,中国从“潜在对手”成为现实最强劲“竞争对手”,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维持东亚霸权、削弱中日韩紧密合作的机制出现明显松动,至少日韩与中国开展合作,在经济上率先与中国形成共同体的意识已悄然形成。

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除了意欲打压潜在对手之外,还顺便将铁杆盟友的几个国家也捎带上了,其中日本、韩国都纳入美国重点打压对象范围。2017年8月特朗普针对中国“301条款”已不仅是在贸易逆差问题上与中国展开贸易战,而是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造成了巨大冲击,“301条款”所列的中国机械制造、电子、半导体芯片等产业与日本、韩国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8次动用过该条款,其中5次针对中国,其他3次分别是对巴西、日本和韩国,可见,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将中日韩都卷入其中。三国在维护自由贸易、构建开放型经济方面具有强大的合力。RCEP谈判历时八年,最终于2020年11月15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这意味着一个包含中日韩在内的15个国家、人口达22亿、GDP达29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形成。这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里程碑,为推动疫情期和疫情后的区域、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也证明了中日韩维护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的明确态度,并在经济层面上明确反对美国的倒行逆施,反对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破坏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制。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浦田秀次郎认为,“RCEP先缔结成功,中日韩达成FTA的障碍就会小很多,因此在RCEP框架下,中日韩

FTA是可以缔结的。”^①拜登上台后“建制派”卷土重来,调整东亚政策,但从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结果来看,中日韩经济与市场高度依存,任何一国遭遇美国制裁,其他两国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三)三国的“抗疫”合作与思考

2020年初,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中日韩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政府和民间相互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三国深刻意识到很难在防疫当中独善其身,因而积极响应并自觉增强共同体意识以形成东亚“抗疫”合作模式。第一,三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虽然采取的“抗疫”方式不同,却共同遵循了儒家先哲的敬畏生命的理念。中国采取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防疫措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人力、物力、财力等迅速发往前线。”^②韩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管控与核酸检测措施,制定出把病床留给最迫切的病人的制度,将患者分成无症状、轻微、重症和危重四类,只有病情最重者和老人才能住院就医。日本采取了看似“佛系”的抗疫方式,但实际上对生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由自民党推荐的担任政府专家会议副座长的尾身茂最为担心的是,“没有病症的人涌向医疗现场会导致医疗体系崩溃,应对此做好一定的准备,对出现病症、置之不理就有危险的病人及早进行核酸检测,防止重症化是最为重要的。”^③可见,三国在防疫过程中都遵循了儒家倡导的生命宝贵的基本理念,体现了荀子在《王制》篇中所讲的“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的儒家信条。第二,三国从疫情之初就对“病毒”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遵循人道主义精神,以科学、理性、合作的方式

① 《中日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专家:RCEP为中日韩FTA提供商谈基础》,第一财经网站,2020年11月1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422852302867116&wfr=spider&for=pc>.

② 《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人民日报》2020年3月3日。

③ [日]「国会会でコロナの今後と安倍首相「休校」の是非を聞かれた専門家2人の立場と葛藤 尾身氏×上氏の濃密2時間」、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3月11日。<https://www.fnn.jp/articles/-/25450>.

反对将病毒加以“政治化”，不给病毒增加国别或地方色彩，而是坚持将病毒视为人类的公敌。中国政府和人民主张，“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①在3月11日的日本国会答辩中，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尾声茂和上昌弘两位专家虽然就防疫措施中是否进行核酸检测存在严重对立，却共同认为“没有必要将病毒称之为‘武汉病毒’，不能加以政治化。”^②第三，在疫情滚动暴发的过程当中，中日韩相互施以援手，政府和民间携手抗疫堪称国际抗疫合作的典范。正如王毅外长总结三国合作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团结协作，先后举行了特别外长会议和卫生部长会议，我们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保持密切协同，形成防控合力，从而有效遏制了病毒在这个地区的扩散。我们三国民众守望相助，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时代新篇。可以说，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为全球抗疫树立了榜样，也为国际社会增添了信心。”^③第四，在“复工复产”阶段，三国在加强防控、抗击疫情的同时，也采取诸多恢复、稳定经济的合作。2020年6月4日，东盟与中日韩举行10+3抗击新冠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会议发表《关于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指出将通过解决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投资、拓展合作领域等方式加强经贸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区域经济增长。^④中日两国政府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于2020年11月30日启动便利双边商务等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12月11日三国卫生部长发布就新冠对策合作的联合声明。可见，三国的合作抗疫不仅仅体现为困难时刻的物资互助，更是在共同体意识指引下，展开机制合作、医卫合作、道义支持等。

① 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求是》2020年第6期。

② 「国会中でコロナの今後と安倍首相「休校」の是非を聞かれた専門家2人の立場と葛藤 尾身氏×上氏の濃密2時間」、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3月11日。
<https://www.fnn.jp/articles/-/25450>。

③ 《王毅：中日韩联合抗疫为全球抗疫树立样板》，新华网，2020年5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4/c_1210631749.htm。

④ 《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视频会议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新冠疫情对三国的经济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对中日韩 FTA 谈判产生了滞缓的负面影响,同时三国在共同抗击疫情期间对彼此的产业融合度、地缘关系重要性、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有了深刻认识,面对人类公敌,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平等包容的眼光看待彼此,方能战胜新冠病毒。因此,越是在疫情冲击和经济承压的背景下,越是要推动三方的朝野形成经济共同体意识,以此突破此前一直受制于政治、历史恩怨的纠葛,缓和东亚的政治与安全局势。

三、东亚地区率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从根本上看,阻碍中日韩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阻力还是来自于三国的国内因素,同时推动三国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也是来自国内因素。因此,欲解决三国在非传统领域的共同问题,除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之外,还需要突破以下五个方面的障碍,寻求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方案。

第一,三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应成为束缚三国合作的政治障碍。日韩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韩往往自诩为民主国家,不认可中国是民主国家,甚至将中国视作“独裁政治”的国家,且深受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影响。然而,回溯三国的关系,就可以发现,40 多年前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和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之际,两国在东亚开启的互利合作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带来东亚持续繁荣,当时的体制差异和民族主义情绪要远比今天差异更大,却阻挡不住中日两国走过“蜜月关系”时期。中国持续打开国门、经济总量不断增强,只要发展中日韩关系的方针与政策不改变,那么三国在“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共同发展的本质和大方向是不变的。

第二,自由贸易并不导致三方国内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关于这一点引起争议最大的还是相对发达的日本,日本国内受到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错误认识影响,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日本国内产业因为寻找低成本而纷纷逃离日本,加速日本部分地方的产业出现

严重空心化。就此,安倍晋三还专门对日本国内民众进行过说明,“确实有部分人对自由贸易进行指责,但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源泉。所谓自由贸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误解,应该要通过经济政策消除。”^①

第三,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的迅速复兴使得“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日韩两国都有不少市场,两国隐约不安的心情溢于言表。显然这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中韩建交 20 多年达成共同发展现实的无视,更是对历史与文化理解的缺失。实际上,甚至连西方世界最为喧嚣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无法适用于解释中日韩“命运共同体”,日韩应当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三国的历史文化同根同源,中国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对日韩产生过任何威胁,哪怕是文化输出也都是日韩两国主动到中国寻求发达文化的传播。今天,中国的崛起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是在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基础之上,走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来努力发展壮大自身的道路。也正因此,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第四,领土争议和海洋权益纠纷虽然是现实政治与地区安全的燃爆点,但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and 有效管控。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中日之间(钓鱼岛)、在日韩之间(独岛或竹岛),甚至是中韩之间(苏岩礁)都挑起过纷争,这些纷争不仅涉及领土争议还与三国的海洋权益密切缠绕在一起,一旦与三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三国关系恶化的燃爆点。但 2018 年中日正式启动可以进行相互通报的“海空联络机制”,双方通过舰艇和飞机能够实现无线直接通信,并在防务部门之间进行直接对话,有效降低在争议地区可能出现舰机冲突的几率,成为未来两国危机管控和改善安全关系的重要机制和平台。这种做法除了预防和减少危机出现的概率之外,还能够让双方形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的“底

① [日]「安倍首相『自由貿易が格差拡大は誤解』『日本では貧富の格差は縮小している』」、投資マネーまとめ速報ホームページ、2016 年 11 月 22 日。<https://xem-ch.com/monkey/post-19841.html>.

线共识”。因此,中日韩需就此类问题形成共同采取克制的态度,共同加强分歧管控、适当搁置争议,努力突破在三国共同合作下人为设下的障碍。

第五,破除东亚区域领导力量缺失的伪命题。以往学术界探讨中日韩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之际,往往将中日两国在区域内争夺领导权问题加以扩大化解读,甚至是将中日两国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激烈竞争视作合作的主要障碍,^①或是认为日本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不作为的外交状态。^②随着最近十年中日经济体量的差距不断拉大,日本朝野深刻意识到日本经济体量难以比肩中国且难以脱离中国经济的现实。所谓领导权问题被轻而易举地淡化了,已然被以经济体量为基础的主导权所取代。中日两国也无需纠结于领导权的争夺,反而应该更重视如何在一体化进程中各自承担适当的角色、定位与作用,三国能够通过增强建设中日韩的“命运共同体”认识实现制度和治理的创新。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中日韩合作中,起到“压舱石”作用的依然是经贸往来,且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乎东亚国际秩序的中日韩 FTA 建设,在经过 16 轮谈判之后,三国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态势已经和启动谈判之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了。过去种种被视为阻碍三国走向“命运共同体”合作道路的因素被逐一破除,中日韩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第十一大经济体,其 GDP 和对外贸易总额都占世界的两成以上,而且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平稳发展,三国的经济实力和总量具备进行整合、提升的条件,中日韩将真正成为超过北美自贸区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引领作用的区域共同体。

结语

三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合作开展东亚治理的重要性。中国总理李

① 刘昌黎:《“鸠山构想”与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于志群:《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与对策——以日本为视角》,《国际商贸》2019年第2期。

② 赵宏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

克强表示,“三国互为重要发展伙伴,经济互补性强,产业融合度高,虽然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波折,但三方坚持通过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三方要总结经验,规划下一个十年合作蓝图,建立“三赢”关系,三国拥有悠久的人文交流历史,……深化在环境保护、人口老龄化、海洋垃圾等问题上的合作。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三方要紧密合作,持续扩大共同利益,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卫生、老龄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密切人文交流,巩固面向未来的合作基础。^①从中可以看出,三国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上有着一致的意愿和动力。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滞缓了三方的治理合作,同时在疫情突发因素的应激下,三国也很容易将此前积累的合作态势进一步释放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客观上推动中日韩携手相助、相互积极开展支援防疫。一方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三国提供合作的时间窗口并不会永远存在,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的三国抓紧时机加强共同体建设更显弥足珍贵,更应加大力度对冲美国向日韩进行的“遏华、联美”的战略施压;另一方面是科技革命催生的人类文明基础变量时不我待,疫情已经在深刻地涤荡着国际格局,疫情之后三国在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将会处于化解化和世仇化的分水岭之上,这种分水岭当然既不是朝贡体系,也不是大东亚共荣,而是迈向新时代的休戚与共的邻邦。换言之,面对新冠疫情,中日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中日韩的“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绝不只是疫情期间才迸发出的“共同体意识”,更是中日韩整体结构在历经多年变化之后的一种自然体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的中日韩合作的东亚治理已初具自觉。

^① 《李克强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新闻网,2019年12月25日。<http://www.sc.chinanews.com.cn/shouye/2019-12-25/118353.html>.

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s come to strengthen since 2017, with steady growth of cooperation scale and trade volume, which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reg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Keywords: Russia; 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Northeast Asi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in the " New Three Kingdoms Era"

CHEN Xia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need to properly handle the common problems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such as the growing aging population with fewer children, garbage disposal, drug smuggl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biodiversity. The regional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has provided a huge source of power for South Korea to reduce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community. In order to take the lead in promoting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need to give priority to breaking down five obstacles. The outbreak and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in 2020 has stimulated and released th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accelerated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Keywords: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 new three kingdoms era" ; South Korea; COVID-19;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overnance in the East Asia

Promoting Mongolia-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Epidemic

[MOL] **TUMUR Nasanbat**